

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的图像来源

郭 满

内容摘要:早期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多未标明具体的参考文献,《中国植物志》即是一例。经过综合比对后发现,《中国植物志》中大部分的动物图像源自明代画谱《图绘宗彝》。在卜弥格绘制的中国地图上,《中国植物志》中的动植物图像作为装饰物点缀在地图周边。卜弥格借用《图绘宗彝》中的图像向西方传递中国的动植物信息,为同时代及其后的欧洲汉学家撰写有关中国的著述提供了素材,图像本身也随之发生变化。西方人对中国古典文献资料的解读方式有所不同,画谱或医学书籍同样具有了植物学和博物学的价值,启发我们以多样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文献的知识价值。

关键词:卜弥格 《中国植物志》 《图绘宗彝》 传教士汉学

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是欧洲汉学的先驱之一,向欧洲传递了中国的科学、医学、哲学等诸多信息,其著述经整理后收录于近年翻译出版的《卜弥格文集》^①。目前关于卜弥格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外关系、医学、地图学、汉学研究等方面展开,也逐渐深入到文本内部^②。《中国植物

①[波]卜弥格著,[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波兰文翻译,张振辉、张西平中文翻译:《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②黄一农:《两头蛇:清末明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7-386页。张西平:《关于卜弥格与南明王朝关系的文献考辨》,《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93-100页。善渊:《波兰汉学的奠基人:卜弥格》,《国际汉学》2009年第2期,第72-99页。张振辉:《卜弥格与明清之际中学的西传》,《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83-202页。张西平:《卜弥格与中医的西传》,《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23-128页。王永杰:《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卜弥格中国动植物研究》,《健康与文明——第三届亚洲食学论坛(2013绍兴)论文集》,第364-371页。张和轩:《卜弥格著述对欧洲汉学的贡献与影响探析》,《基督教思想评论》第23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82-193页。刘美华:《波兰汉学家卜弥格》,《中国读书报》2013年10月(转下页)

志》(*Flora Sinensis*)是卜弥格生前公开出版的两部著作之一,其中绘有动植物图多幅,是欧洲关于中国动植物的首部文献。至于《中国植物志》中的知识与图像的来源,波兰学者爱德华认为卜弥格是依据实地考察和直接经验写作《中国植物志》一书^①,这样的论断有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中国植物志》虽以植物志命名,但实际上包含动物、植物两个部分,就动物部分而言,共有8幅动物图像,其中5幅直接源自明代刊印的画谱《图绘宗彝》。学界此前已注意到《中国植物志》与《图绘宗彝》的文本关系^②,但尚未就此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比如图像的具体绘制、图像的流布演变,以及卜弥格本人对图像的使用情况等等。职是之故,有必要重新考察、评述卜弥格向西方传递中国动植物的表达方式和知识源流。《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出版和演变过程也提示我们,早期西方传教士一般会综合多种文献资料作为其写作的素材,对于如何理解和阐释中国知识存在着个体差异性^③。

一、《中国植物志》的出版

《中国植物志》大致完稿于1653至1655年之间,1656年在维也纳出

(接上页)23日第19版。张西平:《卜弥格与欧洲专业汉学的兴起——简论卜弥格与雷慕杀的学术连接》,《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第107-119页。汪前进:《卜弥格〈中国地图集〉研究》,《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第37-58页。[美]魏若望著,崔祥芬、王银泉译:《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大秦景教”碑情况介绍:卜弥格和刘应发挥的作用》,《国际汉学》2017年第3期,第27-36页。[波]罗伯特·丹尼尔卢克著,王银泉、崔祥芬译:《卜弥格、卢安德和穆尼阁:三位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文献精选》,《国际汉学》2017年第13期,第147-155页。[德]柯兰霓著,王银泉、杨丽雯译:《旅行中的传教士:卜弥格与东亚的宗教》,《国际汉学》2018年第15期,第33-51页。付璐、肖永芝:《波兰传教士卜弥格药学著作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18年第48卷第3期,第158-163页。[德]柯兰霓著,李秀梅译:《永历帝肇庆朝廷里的瞿安德和卜弥格》,《国际汉学》2019年第3期,第34-44页。

①[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

②具体参考周琰:《从未知国到异托邦:17-20世纪西方在中国的植物猎取》之一,来自澎湃·思想市场,网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133124,2022年4月11日访问。

③有关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参见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

版^①,有黑白和人工着色两个版本,目前主要保存在欧美公立馆藏机构^②。虽然卜弥格有出版的计划,但该书的付梓过于突然,似乎只是耶稣会士向即将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的献媚之举。其中包括一篇颂扬利奥波德的颂词,一篇有关圣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 1505-1522)的生平和传教贡献,同时附有一幅与图书主题并不相符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③。波兰学者爱德华称卜弥格曾撰一部名为《中国动物史》(*Historia animalium Sinensium*)的拉丁文著述^④,并据以推测《中国植物志》中的动物节选自《中国动物史》。爱德华所言非虚,在1862年和1888年的图书馆目录名单中均曾著录卜弥格的书稿,其中1862年多达14种书目,《中国植物志》与《中国动物史》分别为第一种和第十四种,到1888年再编目录时只有六种,《中国动物史》已从目录中删除,仅剩《中国植物志》,而两本著作的实体俱已不知所踪^⑤。

《中国植物志》出版之迅速虽在卜弥格的意料之外,不过却为他赢得了诸多声誉^⑥,对于中国动植物的研究和引介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意义^⑦。

①Michel Boym, *Flora Sinensis: fructus floresque humillime porrigens serenissimo et potentissimo Leopoldo Ignatio, Hungariae regi florentissimo, &c. Fructus saecul promittenti Augustissimos*, Viennae Austriae: Typis M. Rietij, 1656.

②根据爱德华的研究,目前有八本《中国植物志》留存下来(参见[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208页),不过据笔者考察,在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Library也有黑白版本贮藏。

③对比《中国植物志》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以发现,碑的图像与卜弥格《中国地图集》中在福建分省地图上绘制的泉州石碑更为相似(参见[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216-217页)。

④[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波兰人17-20世纪在向欧洲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中的贡献》,《国际汉学》,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225页。

⑤Józef Brown, *Biblioteka pisarzy asystency polskiej Towarzystwa Jezusowego powiększona dwoma dodatkami: z których pierwszy zawiera polskie i rossyjskie tłumaczenia, drugi wydania pisarzy Towarzystwa Jezusowego do innych asystency należących w Polsce i Rosyi*, L. Merzbach, 1862, pp. 131-132; Karol Estreicher, *Bibliografia polska: Stolecie XVIII. i dopełnienia do wieku XV-XVII: spis chronologiczny. Cz. 2 t. 2*, wydanie Akademii Umiejętności, 1888, p. 713.

⑥Emil Vasilievitch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1898.

⑦张西平:《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波兰汉学的奠基人:卜弥格》,《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42页。

是书不仅被热衷于编纂普及读物的出版商翻印,也因为耶稣教会组织和印刷发行的关系而为众多关注、研究中国的欧美学者所利用^①,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即为其中一位。耶稣会士基歇尔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传教士一样,未曾亲至中国,但在其专著《中国图说》中不仅采用了卜弥格有关《大秦景教流行碑》的研究成果,也将《中国植物志》中的大黄、绿毛龟、松鼠等编入^②。相关的动植物同样在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绘制的地图集,以及卜弥格的《中国地图集》和医学著作中多次引述和呈现。

就《中国植物志》本身而言,虽名为植物志,但包含了八种动物图像,每幅图配有文字说明,依次为凤凰、野鸡、麝、蝮蛇、松鼠、绿毛龟、豹玄、海马。凤凰是中国传说中神鸟,《中国植物志》将其纳入其中,不少汉学家认为有损于图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③,因为书中尚有名称拼写上的错误。至于为何凤凰会成为卜弥格关注的对象,学界尚未对此提出合理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植物志》出版时,卜弥格已经从里斯本出发前往中国,直到1658年卜弥格方才收到了该部著作。简单的从《中国植物志》图旁撰写的中文熟练程度判断,印刷者基本上不具备中文读写能力或仅仅处于入门阶段,大致属于仿照汉字的描摹而已(见图1)。卜弥格返回欧洲时,曾有中国人陈安德(Andre Don Sin)^④陪同,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即为陈所抄录,所以可以证实,即便是卜弥格的中文助手也未参与到《中国植物志》的编校出版工作。

①[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203-204页。

②Athanasii Kircheri,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Amstelodami: Apud Joannem Janssonium a Waesberge & Elizeum Weyerstraet, 1667. 中文版见[德]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大象出版社,2010年。有关基歇尔与卜弥格的交流概况,参见张西平:《卜弥格与基歇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汇人研究中心编著:《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9-186页。有关地图方面的研究参见郭满:《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台湾测绘、流变问题考析》,《台湾研究集刊》2019年第6期,第63-71页。

③[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④韩琦:《南明使臣卜弥格的中国随从——教徒郑安德肋史事考释》,《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21-126页。张西平:《卜弥格与基歇尔》,第167-1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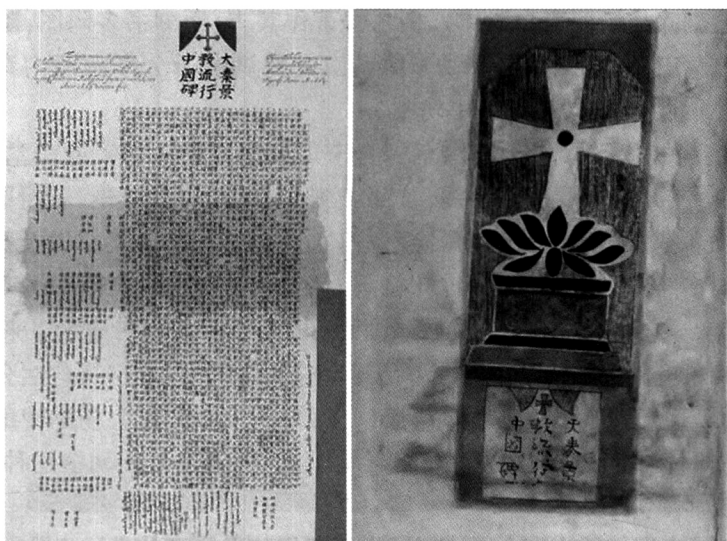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图说》(左)与《中国植物志》(右)中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二、《中国植物志》的图像来源辨析

《中国植物志》的编写体例尚称得上统一。书中的植物和动物图文并茂,并题写汉文和注音名称。除开篇的椰子、槟榔外,其他排版格式均为图像在前,文字说明在后。植物篇中一种植物一幅图像,动物篇中有六种动物两两分布在三幅图上,另外两种动物分别在一幅图上。因为《中国植物志》出版时作者的不在场,以及东西方之间知识传递的历史性局限,学者多难以辨析书中动植物的真实性及其来源。经过与《图绘宗彝》一书进行比较,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植物志》中的动物形象有5幅直接源自该书。以现代学科体系分类而言,《图绘宗彝》与《中国植物志》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一为介绍绘画笔法技巧,属于艺术学的范畴;一为介绍动植物样态特性,属于博物学(或植物学)的领域,两者的相遇得益于卜弥格的引入和《中国植物志》出版者的创造性发挥,也提醒我们审视传统文献时应突破既有的学科框架。

(一)《图绘宗彝》概貌

《图绘宗彝》为明代杨尔曾辑撰。杨尔曾,字圣鲁,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卒年不详,号雉衡山人,又号夷白堂主人,别署卧游道人、草玄居士,约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前后在世^①。《图绘宗彝》有万历三十五年(1607)夷白堂刊本、万历间金陵文林阁刊本、日本享保二十年(1735)江都书肆嵩山须原屋

①杨尔曾辑:《图绘宗彝》序言,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新兵卫覆刻武林杨衙夷白堂本。杨尔曾著作甚丰,所刻书多附图,除《图绘宗彝》外,另有《仙媛纪事》《新镌东西晋演义》《韩湘子全传》《海内奇观》等通俗作品传世,是一位作家兼书坊主。

《图绘宗彝》系画法图解,继承了自宋以来的画谱传统。夷白堂刊本流传最广,由徽派名家蔡冲寰绘图,黄德宠刻^①。每卷前载画论,后附图示,每幅画旁均载有该画的主旨。《图绘宗彝》主要内容为木版画集以及画论,包括人物山水、翎毛花卉、梅花、竹叶枝条、兰花、兽畜虫鱼、各家画论等,共计八卷,收录版画 300 余幅。书中载录图画、论画之作,多辑自宋元以来前贤著述。目前可追溯的明确来源有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顾炳《历代名公画谱》以及万历三十三年(1605)周履靖《夷门广牍》^②。总而言之,杨尔曾编纂《图绘宗彝》的目的在于提供可供借鉴的绘画技巧,而不是有关动植物种类的搜寻和呈现。

(二)《中国植物志》对《图绘宗彝》的图像移借与增补

《中国植物志》中的动物图像大多直接借鉴自《图绘宗彝》。该书对于《图绘宗彝》中图像的采借,使其脱离了原有的篇章结构,并通过文字叙述赋予图像以新的意涵。不过,《中国植物志》的出版者对于《图绘宗彝》并非照录,大致有三种利用形式:一是保留原图样式,增补新的名称;二是拼合两幅分立的图像为一幅;三是借用中文名称,增补新的图画。黑白版与彩色版的《中国植物志》内容上并无不同,仅在图片和文字的顺序上稍有差异。另外,《图绘宗彝》借鉴《历代名公画谱》中的图像颇多,不过进行了重新命名,间接被《中国植物志》引用的有《鸡》和《松鼠》两幅(见图 2)。

①蔡汝佐,字符勋,号冲寰,生卒年不详。善画人物、山水、花卉、梅竹,尤工诗意图,亦能刻版画。曾与丁云鹏绘《唐诗画谱》,陈继儒《六合同春》《丹桂记》中的插图,皆出其手。黄德宠,又名黄宠,字玉林,生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卒年不详。明徽州新安黄氏第二十六世刻工,为名刻工黄銓之子。万历三十三年(1605)和三十五年(1607)分别为杨尔曾的《仙媛纪事》和《图绘宗彝》镌刻插图,这两部作品被誉为徽州划时代版画杰作,对徽派版画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参见杨尔曾辑:《图绘宗彝》,第 1-2 页)。关于木刻画谱的研究可参见张影:《明清木刻画谱与中国画传承相关性研究》,淮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有关杨尔曾撰刻图书与道教之间的关系研究参见龚敏:《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文学新铎》2009 年第 10 期,第 195-230 页;许媛婷:《道教国度的仙履奇缘——明代女仙传〈新镌仙媛纪事〉探析》,《故宫文物月刊》2009 年第 313 期,第 93-101 页;王岗:《作为圣传的小说,以编刊艺文传道》,盖建民编:《开拓者的足迹:卿希泰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2010 年,第 467-479 页。

②祝重寿:《中国插花艺术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7-1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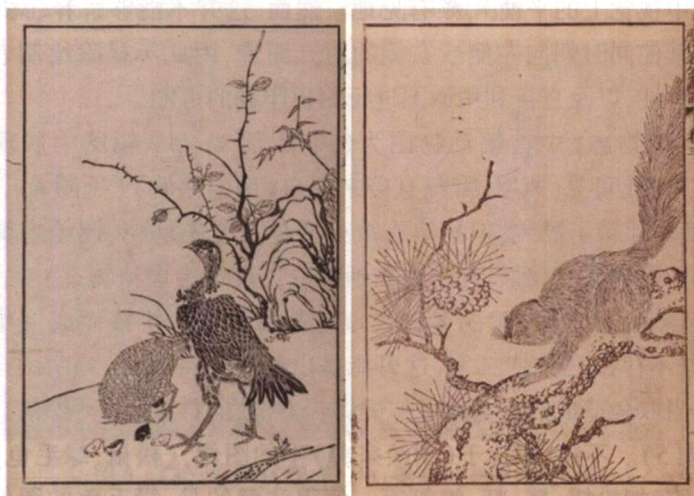


图2 《鸡》《松鼠》(来自《历代名公画谱》,天明四年谷文晁摹本,
东京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整体而言,凡是《中国植物志》中从《图绘宗彝》借用的动物图像均为一种镜像的呈现,这也导致名为《玄豹》的动物成为《豹玄》(见图3)。这种现象在欧洲早期或中西方之间有图像绘制借鉴的历史中不乏其例,例如《海怪图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就有部分鱼类与其参考的原图在方向上是相反的。Daniel Greenberg 经初步研究后认为,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达到在左右



图3 《玄豹》《豹玄》(分别来自明万历三十五年夷白堂刊本
《图绘宗彝》与1656年维也纳彩绘本《中国植物志》,以下同)

对开版式中视觉上的平衡^①,颇有见地。然而,这并不能够解释《海怪图记》中存在的其他同时朝向左侧或右侧的对开图像,因此不排除绘制者图绘过程中的随意性,以及直接利用原图进行刻板印刷的可能。

《中国植物志》中首幅动物图为《凤凰、野鸡》,一幅图中展现两种动物^②。经过对比可见,凤凰、野鸡直接来自《图绘宗彝》(见图4)。不同的是,凤凰基本保持了原貌,但是鸡有数处变化。首先是在《图绘宗彝》中,鸡的图像是和野蔷薇、鸡雏一起出现在画面中,但在《中国植物志》中,鸡雏、野蔷薇消失不见;其次,野鸡的名称应该是野蔷薇和鸡拼接而成,《中国植物志》图中并不存在“野鸡”二字,这可能是出版者在将凤凰、鸡两图合为一图之后不适当取舍造成的。与此类似的编辑办法,同样见之于《松鼠、绿毛龟》一图(见图5)。不过,相比于《图绘宗彝》中的图像,《松鼠、绿毛龟》删减了更多的内容,如松树、蟹、虾、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绿毛龟的图像来源虽然能够确定,但却没有绿毛龟的文字记载,显然卜弥格有参考其他文献。对照后发现,《本草纲目》中虽然有绿毛龟、凤凰的记载和图像(见图7),但卜弥格并未直接采用,绿毛龟的图像取自《图绘宗彝》。至于绿毛龟的文字描



图4 《凤凰》《野蔷薇、鸡、鸡雏》和《凤凰、野鸡》
(分别来自《图绘宗彝》《中国植物志》)

①Daniel Greenberg 著,康淑娟译:《院藏海怪图记初探——清宫画中的西方奇幻生物》,《故宫文物月刊》2007年第297期,第38-51页。

②在1656年维也纳彩绘本《中国植物志》中凤凰和野鸡在同一图中,中译本《卜弥格文集》中拆分为《凤凰》《野鸡》两幅图,如此处理不便于读者把握原图的脉络,同样的处理见之于松鼠和绿毛龟、麝和蚰蛇、松鼠和绿毛龟(《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342-356页)。

述,据卜弥格记述,他曾亲闻亲见,主要分布在河南省^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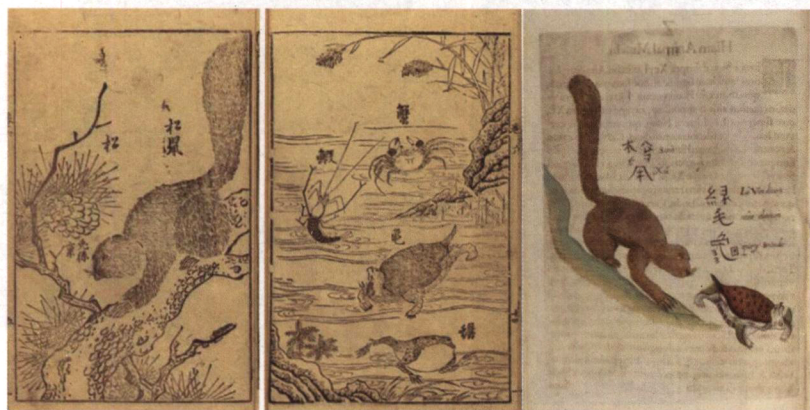


图5 《松、松鼠》《蟹、虾、龟、蟾》和《松鼠、绿毛龟》
(分别来自《图绘宗彝》《中国植物志》)

《中国植物志》中的麝、蛇^②两种动物图源并非来自《图绘宗彝》,也与《本草纲目》中的形象也有所区别,可能与《海马》图一样,是出自欧洲画者之手或有欧洲的图像来源。《图绘宗彝》只有鹿,没有麝,而《中国植物志》中麝的形象很是凶悍,长着獠牙,没有尾巴(见图6)^③。在《中国地图集》中,卜弥格记述称,“我有一张这种动物的画像,是一个波斯商人送给我的,他和我一起去过欧洲,亲眼见过麝这种动物”^④。因此,麝的图像可能来源于此。其与《本草纲目》中麝、蝮蛇的形象也无相似之处,但在关于麝的中文名称书写形式上似有参照《本草纲目》的地方(见图7)。《中国植物志》中的《麝》明显书写“麝”和“鹿香”两个词组,可能是“香麝”或“麝”的误植。

关于《海马》的意象是比较有趣味性的。以海马为题的图像在《图绘宗彝》一书中是存在的,图中的海马与陆地上的马区别不大,只是位于波涛之中的环境衬托出其生活在海中(见图8)。这种认知符合古代中国的“化生

①从卜弥格《中国地图集》中的河南省地图上绘有绿毛龟可知,《中国植物志》中对绿毛龟的介绍可能有误,卜弥格论述的绿毛龟应该分布在河南而非海南。在中译本《卜弥格文集》中译者张振辉对此有说明(《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206-207、353页)。

②应该是《蝮蛇》,但《中国植物志》中误写为《蝮毒》。

③这样的图像与卜弥格在《中国事务概述》中对麝的描述一致:“麝这种动物的尾巴像猫的尾巴,爪子也像猫的爪子。它的毛有鹿的毛那么粗,但它没有角。它有四颗牙齿,两颗从上顎伸到下面,另外2颗从下顎伸到上面,它的外貌并不好看。”(《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188页)

④《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189页。



图6 《柳、钟馗、鹿》《麝、蛇毒》(分别来自《图绘宗彝》
《中国植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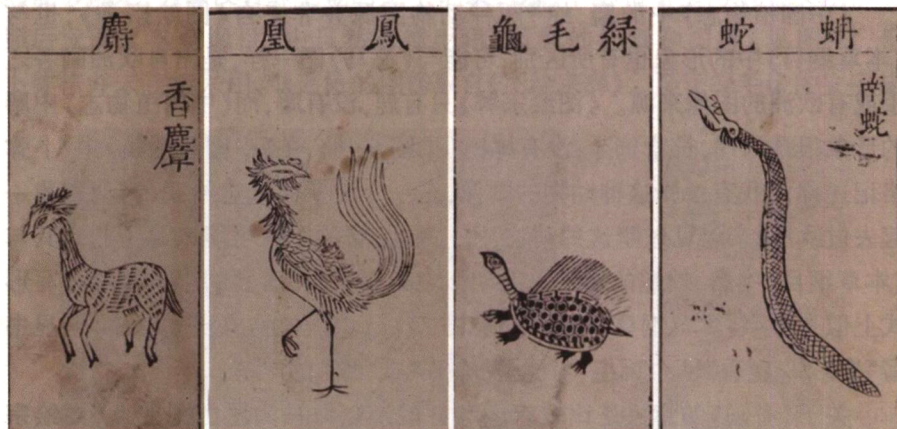


图7 《麝》《凤凰》《绿毛龟》《蛇》(来自《本草纲目》，明万历二十一年金陵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说”，即陆地与海洋生物是相互对应的^①。出版者或者卜弥格显然不能赞同中国图画中的海马形象，故而《中国植物志》只是借用了海马的汉文名，却弃用了海马的图案。在同一时期，欧洲认知中的海马一般上半身为马，下半身为鱼^②。从笔法来看，《中国植物志》有可能是依据文字叙述重绘，因为它与早期欧洲记载的海马的意象也不相符。或许当卜弥格《中国动物史》重见天日后可以解答我们的困惑。

①相近的论述和图像表达见之于清朝聂璜绘制的《海错图》，里面绘有海马的形象，并附图说(文金祥主编：《清宫海错图》，故宫出版社，2014年)。

②刘星：《惊奇与怪异：域外世界怪物志》，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57-60页。



图8 《海马》(分别来自《图绘宗彝》《中国植物志》和
尼古拉斯·德·布鲁因的版画)

《图绘宗彝》中不仅有类似凤凰这般传说中的神鸟,在同一卷中还包括龙、麒麟、獬豸、辟邪等动物,但并未被《中国植物志》收录。可以想见的是,卜弥格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对《图绘宗彝》中记载的动植物作了适当的筛选,并且只是利用其中的图像,而对《图绘宗彝》本身的编纂目的不予关注。选择凤凰的原因,大概也因为卜弥格听闻过,也从官员的朝服上亲见,故而有所记述^①。实际上,《图绘宗彝》并非写实性的图像记录,杨尔曾编纂的目的不过是为文人墨客提供一个绘画的范本。由此观之,传教士时代的欧洲汉学家对中国文献的解读还不够精深。

三、《中国植物志》的早期衍变

至于《中国植物志》中的植物图像,虽以“中国”标识,但生长的地域不限于中国一地,而是覆盖从非洲东岸到中亚、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广泛地域。在植物种类的挑选上也并非全无章法,对桂皮、胡椒等的介绍无疑是欧洲关注香料贸易的体现。就具体植物的信息而言,确有疏漏和错误,如将柿饼视为柿子树的果实等等,不一而足。《中国植物志》中的许多动植物图像同时出现在卜弥格撰写的医学著作和地图集上而各有侧重,如《单味药》多关注有药用价值的动植物,《中国地图集》则试图把动植物的地域分与各省地图结合起来。与卜弥格交际匪浅的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也选择性的把《中国植物志》中的动植物纳入其中,有些维持了原貌,有些则做了图像替换仅保留名称。

(一) 卜弥格《中国地图集》中的动植物

在地图上绘制人物、船只或动植物,乃至怪兽的图像,是欧洲早期地图

^①《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189页。

作品的特色^①。如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某些版本上就布满了奇珍异兽^②。这些附加的事物主要功能是点缀,增加地图的装饰性效果。卜弥格《中国地图集》稍有不同,绘制的动植物图像有了写实的意义,这不啻为对西方既有制图范式的一种超越。另外,《中国地图集》上还包括各省矿物和基督教的分布情形,以及穿戴明朝衣冠的中国人图像。就种类而言,无论是动物或是植物都较《中国植物志》增添了数种,而且绝大多数都能在《图绘宗彝》中找到原型,只不过与原图相比,《中国地图集》中的动植物做了涂色处理。

《中国植物志》与《中国地图集》中重复的动物有豹玄、凤凰、麝、绿毛龟、野鸡和松鼠,在动物形象上二者基本保持一致。限于地图的篇幅,后者文字性的描述部分作了省略。不同于《中国植物志》的出版风格,《中国地图集》把动物与其在中国各省的分布对应起来,实现了知识传递的可视化。另外几种增添的动物包括牛、蟹、金雀和雉鸡。对于蟹,《中国植物志》中略有提及,但并未图绘,《中国地图集》的《海南》地图上,绘有A、B两种不同颜色的螃蟹。《图绘宗彝》中有螃蟹的图像,和绿毛龟在同一个版面,与《海南》地图中的螃蟹有所不同。卜弥格曾在海南传教,亲见过这种海蟹,在《中国事务概述》中对其药用价值也有详细的描述^③。

牛的图像与《山东》分省地图对应(见图9、图10),文字说明为:“中国牛,中国有驼峰的水牛和印度的一样。农民在它的鼻子里套上环扣,骑在它身上行走。在印度,不仅老百姓骑牛,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骑牛。”^④以对比的笔触描述中国的动植物也是卜弥格书写的一大特色。“中国牛”直接取自《图绘宗彝》中的《耕牛》,柳的意象被剔除。《图绘宗彝》中另外一幅《柏树、小牛、牛》图画也有牛的意象,与《柳、耕牛》均来自《历代名公画谱》,只是进

①相关研究参见[美]切特·凡·迪泽著,王绍祥、张愉译:《海怪: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中的海洋异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美]约瑟夫·尼格著,江然婷、程方毅译:《海怪:欧洲古异兽图考》,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7年。

②相关研究参见邹振环:《殊方异兽与中西对话——〈坤輿万国全图〉中的海陆动物》,《海洋史研究》2015年第7辑,第292-333页;邹振环:《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③弥格重点论述海蟹背上的十字架,并将其与南明王朝奉行基督教相关联,显见其对基督教在中国传布情形的关注(《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192、241页)。石蟹的药用价值,卜弥格在《单味药》中也有所介绍(《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478页)。

④卜弥格:《中国地图集》,《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198-199页。

行了重新命名和编汇。另则,若将耕牛与山东结合起来,其实是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山东耕牛一般为黄牛,骑在牛背上还是有难度的,水牛相对而言容易。



图9 《柏树、小牛、牛》(前两幅来自《图绘宗彝》;后两幅来自《历代名公画谱》)



图10 《中国地图集》山东分省地图中的牛

不同于海蟹、牛、金雀和梅花、雉鸡和玉兰花在《中国地图集》上是成对出现的,梅花、玉兰花两种植物成为金雀、雉鸡两种动物的陪衬,两图分别绘制在《浙江》《湖广》地图上。《图绘宗彝》中虽可以找到《金雀、梅花》的图源,但其本意在阐明翎毛花卉但如何绘制,并未言明其中鸟的种类和名称,只有另一幅图上注记“梅树”(见图11)。《浙江》地图上对金雀和梅花注记为“金色的金雀鸟和梅花,它的果实叫梅”^①。《湖广》地图上的《玉兰花、雉鸡》相对简单,直接截取了《图绘宗彝》中原图的上半部分,除上色外,图像结构、中文标记均未改变,卜弥格也没有进行多餘的文字说明(见图12)。

卜弥格《中国地图集》的分省地图上另外绘有太黄、牡丹、生姜、春秋花、茯苓、桂皮树、莲花、芙蓉、芦荻等多种植物图案,只有桂树皮、生姜与《中国

① 卜弥格:《中国地图集》,《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212-213页。



图 11 《金雀、梅花》和《鸣势》《卧月势、梅树》
(分别来自《中国地图集》《图绘宗彝》)



图 12 《玉兰花、雉鸡》二种(分别来自《中国地图集》
《图绘宗彝》)

植物志》中相同,其馀均为新物种。有的物种,卜弥格在《中国事务概述》中做了简略的介绍,如大黄、肉桂、生姜,但也有些植物虽有论述却未见在地图中展示,如人参、甘蔗、黄连、樟脑等等。牡丹、春秋花、茯苓、莲花、芙蓉、芦荻等几种植物仅仅是绘图并标注中文名称,其后未见进一步的补充信息。除茯苓外,牡丹、春秋花、莲花、芙蓉、芦荻等图像均取自《图绘宗彝》,只是在利用原图的方式上略有不同。

牡丹、莲花两图大概遵循着去除其中不需要的成分后直接利用的原则(见图13、图14)。芦荻、芙蓉两种植物在同一个图幅上,与原图相比,不仅仅删除了多馀的鹤鸽形象,同时将图像向左旋转九十度,以求正面呈现的视觉效果。变化最大的当属附在《江西》地图上的《春秋花》,图源为《图绘宗



图 13 《孔雀、牡丹》《莲花、鸳鸯戏水》和《莲花》《牡丹》
(前两幅来自《图绘宗彝》;后两幅来自《中国地图集》)



图 14 《芦荻、芙蓉》《芙蓉、芦荻、鹧鸪》
(分别来自《中国地图集》《图绘宗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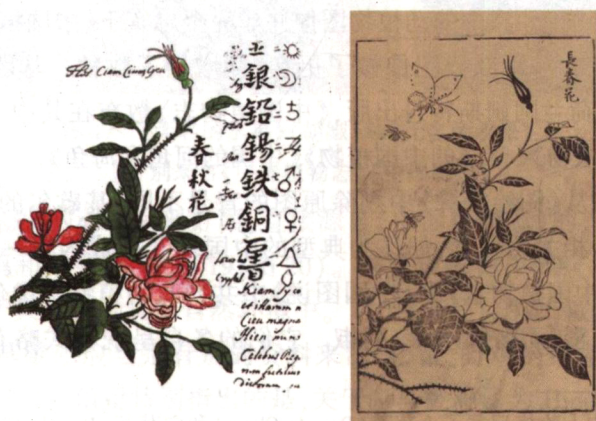


图 15 《春秋花》《长春花》

(分别来自《中国地图集》《图绘宗彝》)

彝》中的《长春花》(见图 15)。长春花和春秋花为不同的类属,其中长春花有医药用途,卜弥格应更为关注长春花才是,尚不知何故将原名改为“春秋花”。茯苓图是《图绘宗彝》中没有的,而绘制在《贵州》地图上。在《中国事

务概述》中卜弥格介绍了一种葡萄牙人称为 Pao da China 的植物,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省,波兰学者卡伊丹斯基认为这种主要功能为药用的植物就是茯苓,卜弥格《单味药》一书中同样有所记载^①。《贵州》地图上的茯苓,卜弥格注记为“中国根,又叫中国”,应为其疏忽误记所致。按照其地域分布,绘制在《贵州》地图上,也与卜弥格自己的记载不相符。因而,动植物与分布地域的结合,只在部分地图上是一致的,如凤凰、麝、蟹和绿毛龟。

相比之下,《中国地图集》中动植物名称的汉字大多可以辨识,质量上要优于《中国植物志》。《中国地图集》还载录了中国基督教和矿物的分布情形。另外还绘有人种图像,如《北京》图上的三幅天子图、《山西》图上的中国士兵图、《南京》图上的皇帝群臣图、《江西》图上的中国官吏图、《贵州》图上的中国官吏接圣旨图 and 中国的宴席图。这种在地图上绘制人物图像的方式最早可以追溯至 1596 年林斯豪腾的《航海记》,其中关于东亚地区的图像虽不准确但却被承继下来^②。

(二) 卜弥格与基歇尔《中国图说》的交集

得益于耶稣会的组织网络和信息联络系统,有关中国的资讯可以在耶稣会士内部流布并有效地传递回欧洲世界。基歇尔从未到过中国,《中国图说》的出版很大程度上仰赖前往东方的耶稣会士,包括白乃心(Jean Grueber, 1623-1680)、卜弥格、卫匡国等等^③。《中国图说》一定程度上是此一时期西方对中国认知的集成,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呈现,卜弥格带回的材料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④。《中国植物志》的大部分内容在《中国图说》中得以再现。然而,《中国图说》中的动植物图像并非完全忠实于《中国植物志》,而是有所取舍。基歇尔对部分图像做了更换,并增加了数种。基歇尔《中国图说》1667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中国植物志》散布在其中三章,分别为《奇异的中国植物》《奇异的中国植物》《中国的河鱼和海鱼》。

与卜弥格从《图绘宗彝》中剔除原图的背景不同,基歇尔的附图则是有意添加与中国相关的元素,如作为典型的中国塔几乎成为每一幅动植物图片的远景。《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图说》中共同有的植物图像包括大黄、木瓜、菠萝、菠萝蜜、无名的水果、胡椒。它们的各自呈现方式略有不同,多数

①在《单味药》中卜弥格记载了土茯苓(Pao de China)和白茯苓(Pao de China)两种药物(《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 442、451 页)。

②李晓璐:《贸易、跨文化交流与趣味再造:宫内厅藏〈万国绘图屏风〉男女对偶图像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87-99 页。

③[德]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第 6 页。

④[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 230 页。

情况下,各种植物不会单株或单独出现,通常是几棵或成为其他植物或动物背景的形式,如木瓜和菠萝、菠萝和印度天堂树、无名的水果和胡椒等等,同时也会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人物形象(见图16)。



图16 《菠萝蜜》《木瓜》《凤梨》(来自《中国图说》)

《中国植物志》中《无名的水果》图像在《中国图说》中被描述为一种生长在浙江的树,果实中的脂肪可以用来制造白色蜡烛,近旁是一株胡椒树,基歇尔把两种植物拼合在一起^①。这与《中国植物志》中认为这种水果生长在海南、广东的习性是有很大不同的(见图17)^②。如果基歇尔描述的是另外的植物,那么选用《中国植物志》中的形象显然就是图文不符。除此之外,书中增加了茶和白藤的文字说明和图像(见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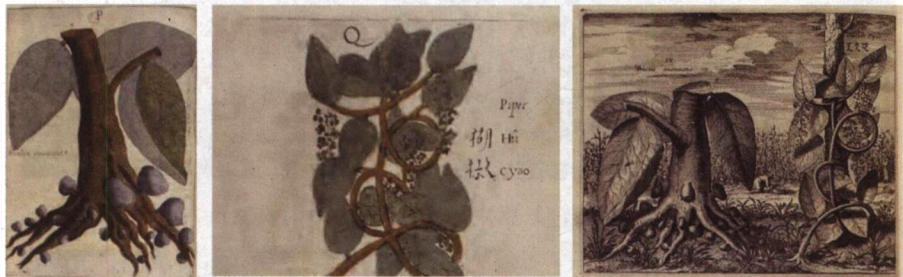


图17 《无名的水果》《胡椒》和《无名的水果》

(分别来自《中国植物志》《中国图说》)

《中国图说》的动物呈现方面,直接源自《中国植物志》的有麝、海马、松鼠、凤凰、野鸡和绿毛龟(见图19、图20)。与展现植物相似,《中国图说》中的动物被置于其生存的具体自然环境中。对于《海马》图像,截然不同于《中国植物志》,基歇尔应当是有别的资料来源,松鼠、野鸡的形象也有所变化(见图20、图21)。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海马被对译为 Hippopotamus amphibius,即河马,是完全错误的,对照《图绘宗彝》与《中国植物志》可以发现其中文名称为海马无疑。在某些中文的转写上,其水准甚至低于《中国植物

①[德]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第338-339页。

②《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第331页。



图 18 《茶》《白藤》(来自《中国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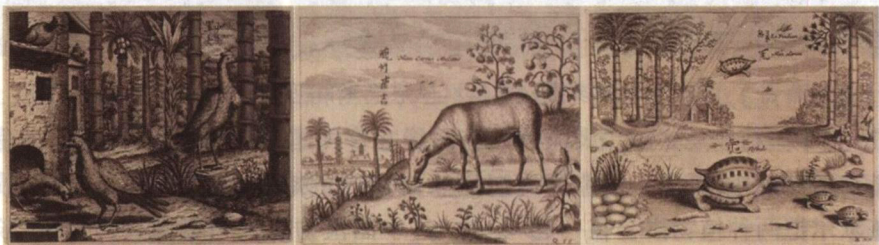


图 19 《野鸡》《麋》《绿毛龟》(来自《中国图说》)



图 20 《海马》《松鼠》《凤凰》(来自《中国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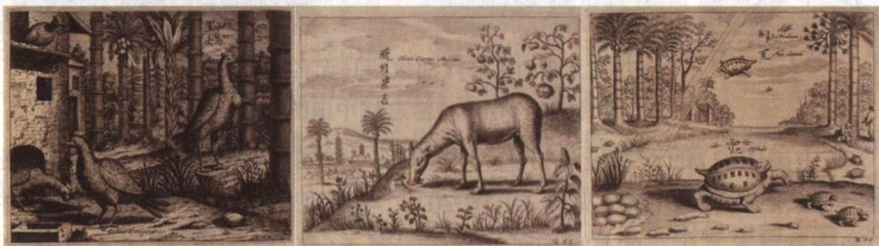


图 21 《野鸡》《麋》《绿毛龟》(来自《中国图说》)

志》，如松鼠的中文已难以分辨。《中国图说》拉丁文版本由阿姆斯特丹主导出版，这样的图书品质对于 17 世纪堪为业界翘楚的荷兰来说让人颇为费解^①。将其与次年出版的荷兰文本《中国图说》对照，高下立见。荷兰文本

①[意]曼斯缪·奎尼、米歇尔·卡斯特诺威著，安金辉、苏卫国译，汪前进校：《天朝大国的景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22-225 页。

《中国图说》对原图进行了镜像翻刻,在维持原貌的基础上进行彩绘。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卫匡国与卜弥格之间显然也曾共享有关中国的信息,这从两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上的一些共同元素中可见一斑。耶稣会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收录在1655年荷兰地图出版商约翰·布劳(Joan Blaeu,1596-1673)的《大地图集》(*Atlas Major*)中^①。学界对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的文献来源、经纬数据、山川绘制等多有讨论^②,却尚未关注到地图之上的动植物图像^③。比如,两人都将中国的动植物、人物形象作为地图的装饰绘制在地图四周。卫匡国的地图更具装饰性和审美功能,这与彼时荷兰地图生产的商业化倾向契合^④。在卫匡国《陕西》分省地图中包括一幅麝的图像,与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以及《山西》分省地图上的麝相同(见图22),二人也分别在地图上标绘中国各省的矿物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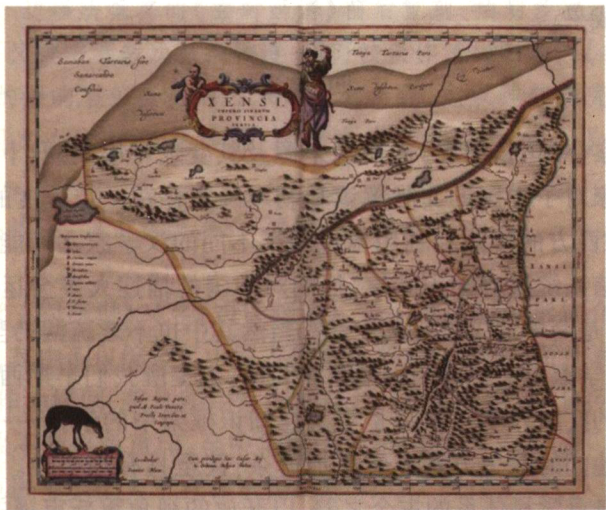


图22 《陕西》分省地图(来自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

① Willem Janszoon Blaeu, Joan Blaeu, *Le theatre du monde, ou, Nouvel atlas*, Amsterdam: Chez Iean Blaeu, 1655.

② 有关卫匡国地图的研究成果参见杨雨蕾:《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考论》,《文献》2021年第6期,第133-160页;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山川绘制》,《形象史学》2021年第3期,第261-191页;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经纬度数据的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1期,第29-43页。

③ 除了卜弥格、卫匡国两人之间相互借鉴的图像以外,其他尚有许多不明来源的、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图像添绘在地图上,这同样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学术议题。

④ 宋念申:《订制:资本时代的东亚画像——16、17世纪尼德兰制图学派中的中国与亚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86-98页。

卫匡国、卜弥格两人大致在同一时期往返于中国和欧洲之间,虽都曾在中国进行传教,但活动区域毕竟有限,因此参考既有的中文文献向西方传递关于中国的知识更为可取。这是早期西方人编撰中国著述的普遍方式。卫匡国与卜弥格之间信息的沟通主要得益于耶稣会内部的通信网络机制,这也是上述《中国图志》以及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诞生的基础^①。基歇尔《中国图说》中也曾引用卫匡国绘制的中国地图,甚至包括卫匡国地图周边的人物装饰^②。故而,虽然卫匡国的地图出版在1655年,时间上稍早于《中国植物志》(1656),但也不能据此断定卫匡国是卜弥格图像的来源。其一,因为依据卜弥格在书中的明确记载,麝的动物图像直接得自波斯商人,而非两人共有的知识源流。其二,即便作为装饰,卜弥格也将图像与具体的省份对应,如麝在山西省,而非卫匡国的陕西。所以,更大的可能是卫匡国借用了卜弥格的成果。

四、结语

通过考察《中国植物志》的图像来源及其变迁可以发现,卜弥格时代的传教士汉学家对于中国的文献解读和利用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中国植物志》在西方的传播和利用也说明了不同的汉学家之间能够利用教会的组织和通信系统进行知识共享,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大多会运用比较文献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采录一家之言。当然其中也不乏疏漏乃至讹误之处。不过,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知识编纂和利用,也提醒我们早期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所依据的文献并不一定总是与现在知识框架中的学科一一对应,在时空局限之下他们的取舍方式显然更加博杂,甚至具有随机性。这同时也促使我们反观自身学科体系的古今之差,以开放的视角重新审视古代文献,医药类书目、画谱类文献也许可以成为自然史、植物学、博物学以至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史料。

【作者简介】郭满,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台湾史。

①《中华帝国全志》是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在编辑《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基础上汇集而成,《中华帝国全志》也成为西方近两个世纪时间里关于中国的经典之作。

②基歇尔对卫匡国地图的借鉴包括地图本身、地图数量和地图周边的装饰几个部分,对装饰性的图像进行了重新组合,地图则基本维持了原貌。这一部分与本文关系不大,拟另文处理。